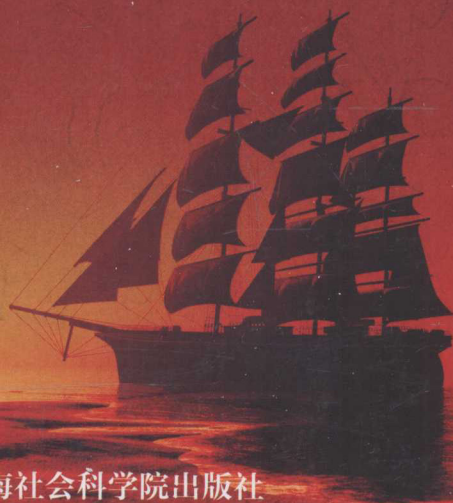


唐宋元

东亚关系研究

TANG
SONG
YUAN

赵莹波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唐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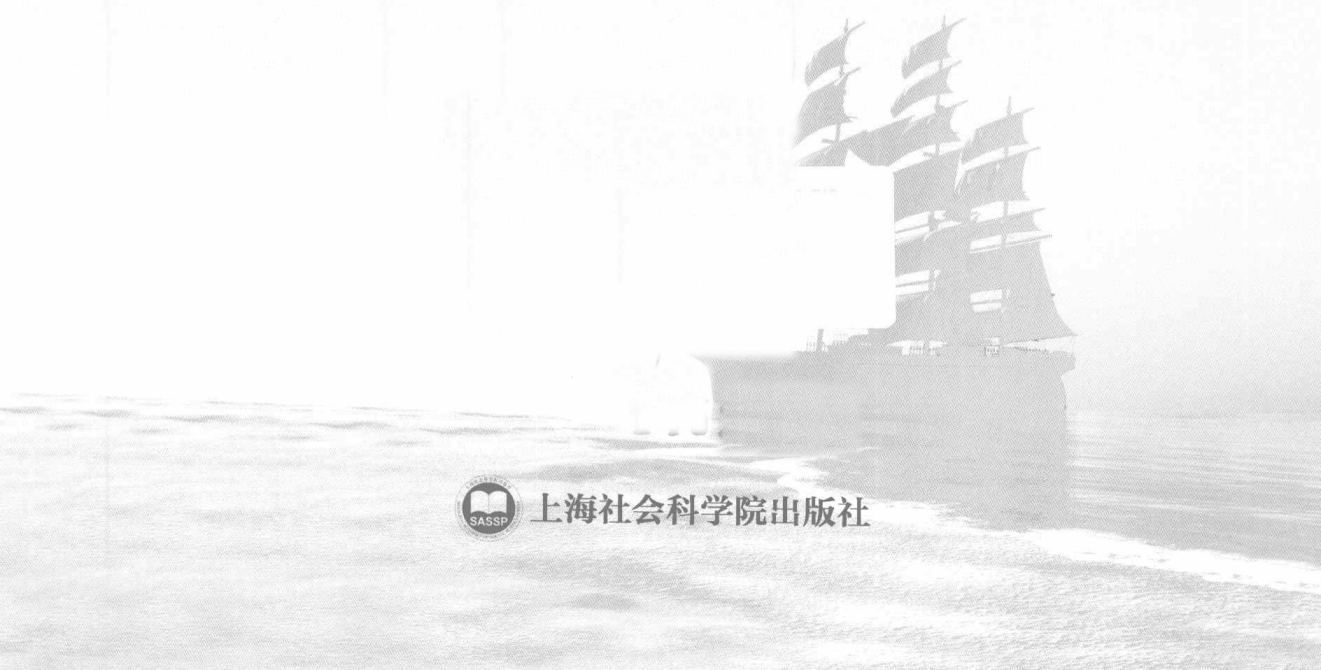
东亚关系研究

TANG
SONG
YUAN

赵莹波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 / 赵莹波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336-8

I. ①唐… II. ①赵… III. ①国际关系史-研究-东亚-中世纪 IV. ①D8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056 号

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

著 者: 赵莹波

责任编辑: 庄晓明

封面设计: 郁心蓝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码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9

插 页: 8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336-8/D·377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3 博多唐人街车站(笔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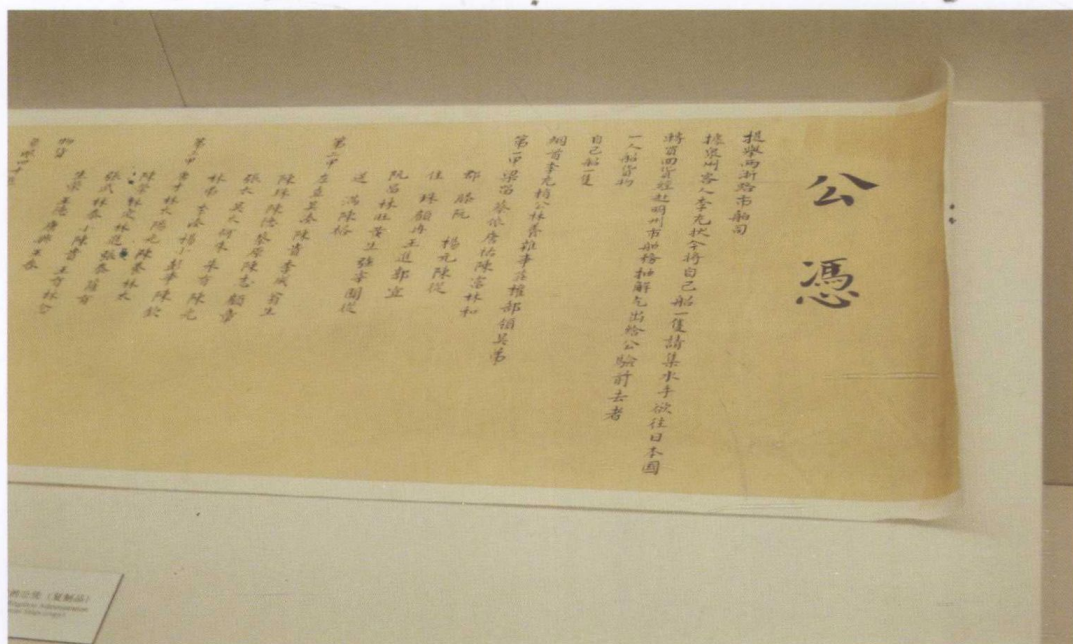


图4 宋徽宗崇宁2年(公元1104年)提举两浙路市舶司公凭(宋商李充的公凭)(复印件)。

宁波博物馆藏(笔者拍摄)



图 1 大宰府都督府遗址(笔者拍摄)



图 2 鸿胪馆遗址(笔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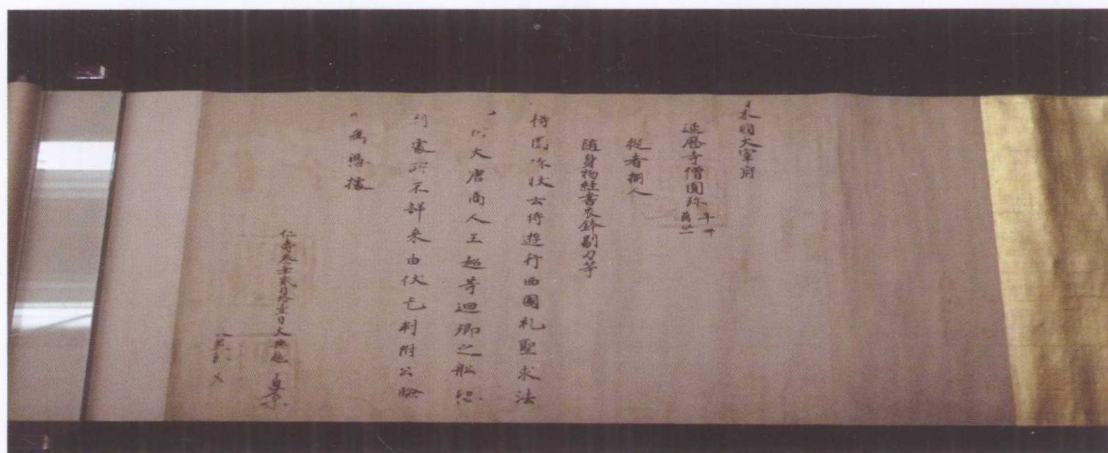


图5 大宰府发给入唐僧圆珍的“公检”(摄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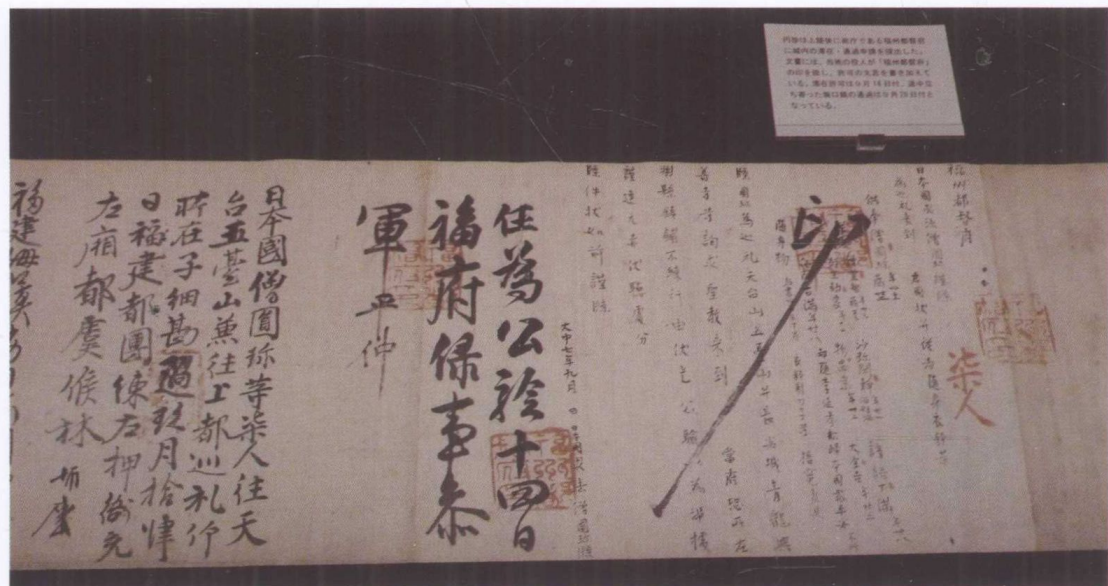


图6 福州都督府在入唐僧圆珍“公检”上的批复(摄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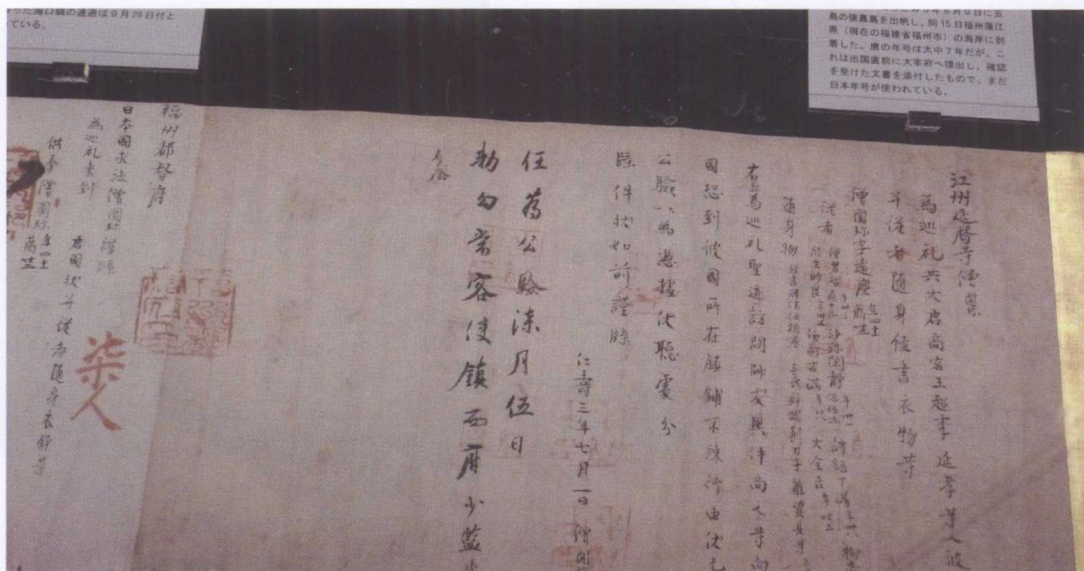


图7 日本镇西府发给入唐僧圆珍的“公检”(笔者摄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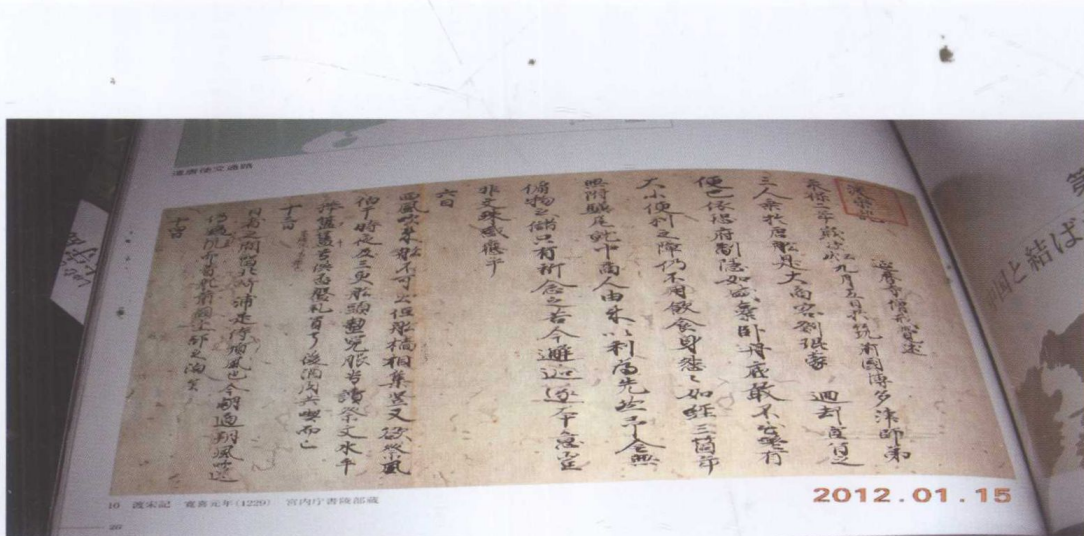


图8 偷渡僧延历寺僧戒觉的《渡宋记》([日]田井玲子,等:
《日中歴史海道 2000 年》神戸市立博物館 1997 年)

前言

本书依据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通过对日本史料《大宰府·大宰府天满官史料》(下称《大宰府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来探讨唐宋元时期的东亚关系。日本作为生存状态较为特殊的岛国,历史上虽出现过“脱宋”“抗元”之类的特殊状况,但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它对外界的情况始终是予以高度关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细致入微的史料记录中得到证实。

《大宰府史料》为日本九州大宰府天满宫所珍藏的史料,分为上世编、中世编、续中世编共计17卷,时间涵盖了从日本飞鸟时期到德川幕府时期(约公元536—1599年),除大宰府天满宫本身所珍藏的原始史料外,还几乎囊括日本各个时期的史书和寺庙馆藏文献。如《日本纪》《日本后记》《日本纪略》《帝王编年记》《扶桑略记》《善邻国宝记》《吾妻镜》《朝野群载》《类聚三代格》和《小右记》等。不仅包括与唐、宋(金)、元、明,甚至新罗、高丽等国家在各领域交流的第一手史料,还收有《宋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中有关中日交往的中文史料,可谓一部日本历史和东亚交流史的百科全书。尽管有些史料在中国文献中也有载录,但因原件遗失或保存在日本等因素,造成在版式、行文断句、年号等诸多方面都与《大宰府史料》有明显差异。无疑《大宰府史料》更加接近历史原貌,是研究中国与东亚关系的珍贵史料。因此,通过对其中的有关宋朝与日本、高丽交往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无论在历史文献学上还是在语言学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甚至对东亚海域史和中日交通的研究也均有价值。

本书共分为十一章,主要以贸易和涉外文书两方面来研究唐宋元时期我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本书以唐宋元为时间轴、东亚地区为历史空间背景,以穿梭于其中的商人和僧人为研究对象。唐朝商人到达日本后,曾一度被日本安排在指定的

国宾馆“鸿胪馆”，但到在宋日贸易初期，宋商的商船靠岸后，需要经过海关“存问”^①，然后才能进行“和市”^②贸易，宋商们住在由日方所指定的宾馆里，在有限空间里开展贸易活动。日方所指定的宾馆究竟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国宾馆“鸿胪馆”还是普通的宾馆？后来宋商走出了“旅馆”，自建“唐房”^③，由“旅馆贸易”转变为“唐房贸易”，这其中的变化既涉及日本对唐宋商人态度的变化，也涉及唐宋时期中日关系变化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本书通过对宋商所携带宋、日、朝鲜半岛国牒加以解读和整理，研究继“册封体制”之后，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在无邦交的情况下，如何以宋商为推介开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准外交关系”模式。“准外交关系”模式是继“册封体制”之后又一种国际新秩序。宋朝面对脱离了“册封体制”的东亚世界，被迫主动探索建立东亚新秩序，由此中国与东亚的关系从传统的“册封关系”模式转为相对平等的新型“准外交关系”模式，具有历史必然性。“准外交关系”模式也可看成元明重建东亚新秩序的过渡阶段。宋朝与日本、高丽这种“准外交关系”模式，为元、明在处理与日本、朝鲜的关系时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是历史的过渡阶段和重建东亚新秩序的前奏。

通过这种“准外交关系”模式，宋朝在与日本、高丽的交往中，通过宋商即可完成国家间的高层互动，能避免使国家关系复杂化。在当时国际关系“无序”的情况下，三国同时利用宋商作为推介和桥梁，充当其“代言人”开启“准外交关系”模式进行政治博弈。

本书把宋元时期出现的中日“涉外伪文书”乱象定位为“非国家性集团行为”。所谓宋元时期中日“涉外伪文书”乱象，是指日本对宋、元遣使“持金不持国书”、入元僧使用“涉外伪文书”、日本对马蕃主对朝鲜伪造国书泛滥，以及宋商入关“公凭”中有“易名”“年号混乱”等现象。本书认为由于两国间政治关系的滞后造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障碍，正因为日本对华方略上的“脱宋”“抗元”外交策略，导致了这种“非国家性集团行为”的出现。同时，又显示出日本国内地方势力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焦虑。“涉外伪文书”的现象正是对这种“非国家性集团行为”的必然反应。因此，本书把这种现象认定为“非国家性集团行为”。“涉外伪文书”现象是日本在中日之间实施的一种特殊外交博弈模式。“涉外伪文书”也是“遣唐使”中断以来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另外，笔者在研读中日两国史料时，发现一些有关台州的重要史料并没有引起

① “存问”，相当于现在海关检查，系国家公权力。宋商船靠岸后，首先由大宰府把作成的“存问记”（入国管理、检查报告书）报送太政官，简言之，宋船到达后，完成“存问”检查，由“警固”或者郡作成“解”呈送大宰府。

② “和市”是贸易前提，宋日之间的价格协定，必须由国家参与决定，比价不能由民间来定。“和市”一词源于汉语，指调整贸易的意思，是政府在交易之际，为了衡量物价贵贱和公平对所在国的物价而制定的规则，相当于现在的货币兑换汇率。

③ “唐房”：唐人街。

中日学者的足够关注,甚至被忽略。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入唐僧”“入宋僧”甚至“偷渡僧”大都从台州开始进入中国,而且台州还拥有完备的海上通关检查机构,唐、宋商船常由此出发驶入东海,来往于日本和朝鲜半岛。台州商人时常搭载“入唐僧”“入宋僧”来巡礼,并受他们委托向天台山传递书籍和奉品。台州商人甚至还担任百济国国使,活跃于日本和朝鲜半岛政府之间。可以说,台州在中日交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完全可以与明州(宁波)相媲美。

本书通过大量史料对台州古代海上交通以及台州商人的研究,把唐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与日本乃至朝鲜半岛间的关系,概括为“商人外交”或“僧侣外交”,也可归纳到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各国之间开展的“准外交关系”的学术范畴。

本书以史料为依托,研究揭示中国、日本及朝鲜半岛在特殊历史时期展开“准外交关系”博弈的历史真相。中国一方仍以大国自居,力图将日本纳入传统的东亚册封体系,在无实效的情况下,乃抓住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尽可能通过商人达成彼此间的正常交往,进而通过商人携带国牒迫使日方“返牒”以造成双方官方实质性接触,以此为政治上的“代言人”,开启以宋商为推介的“准外交关系”模式。日本一方从“崇唐”向“脱宋”转折,但至少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看,完全独立自存又不可能,于是逐步接受这种“准外交关系”模式,但原则上坚持“脱宋”——其基本方略是不以正式国使相往来;朝鲜半岛一方基于对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方面对中国的高度依赖,而力图周旋其间,力图自存、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逐步演化出商人和僧侣为媒介的东亚特殊交往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明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也是率先由僧侣开启和恢复的,因此是否可以把东亚此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僧侣外交”?这或许是今后探讨东亚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实这种外交手段,早在元朝就开始了,可以说是宋朝时期宋商携带国使推动所谓“准外交关系”,为这种“僧侣外交”打下基础。明朝时期民间贸易逐渐减少并被禁止,商人无法穿梭于两国,而僧侣却不受约束,成为代替商人的最佳传递国书人选。同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以及九州地方政府、当地豪族、寺院不断地向朝鲜求《大藏经》、佛钟甚至印章,频繁开展官方和半官方的涉外活动,或许可以把日朝间这种现象定义为“大藏经外交”。

综上所述,从两国关系乃至东亚关系历史脉络来看,唐朝与日本之间可谓“平等外交”,宋朝与日本之间可谓“准外交关系”,元朝与日本之间可谓“伪文书外交”,明朝与日本之间可谓“朝贡外交”或“勘合贸易”(前期为“僧侣外交”),日本与朝鲜之间可谓“大藏经外交”。

目 录

第一章 从“旅馆贸易”到“唐房贸易”看唐宋时期中日关系	1
一、唐代：“鸿胪馆”功能向兼商务性的转化	1
二、宋代：“唐房”的形成	5
三、小结	13
第二章 从“涉外文书”看唐宋时期中日关系	14
一、宋日贸易中的涉外文书	15
二、日本的“派遣僧”和“偷渡僧”涉外文书	22
三、唐朝时期日僧圆珍的涉外文书	29
四、宋商作为国使向日本传递的国书	37
五、小结	40
第三章 从宋商易名现象看中日关系	41
一、“日本锁国政策”	41
二、日本史料中宋商姓氏勘误	42
三、宋商国使易名	44
四、宋商易名现象	46

第四章 从宋商“纲首”与宋日、宋丽交往看东亚关系	48
一、从中日两国出土文物看宋商“纲首”	49
二、从中外史料看宋商“纲首”	53
三、结语	59
第五章 从台州古代海上交通与台州商人看东亚关系	60
一、天台山国清寺与日本僧人	60
二、台州的海外交通与台州商人	67
第六章 从宋商携带国书现象看东亚的“准外交关系”	72
一、日本延喜时期对唐“三禁令”	73
二、宋朝神宗时期对日“三国牒”	74
三、日本与高丽国家关系	77
四、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政治角色	79
五、结论	81
第七章 从“涉外文书”看宋元时期中日关系	83
一、准外交层面涉外文书往来	83
二、经济层面的通商文书	86
三、文化层面的僧侣涉外文书往来	88
四、小结	89
第八章 从“涉外文书”中年号看唐宋元时期东亚关系	91
一、奉金、元正朔；年号同、日月同	93
二、年号殊、日月同	95
三、双年号、日月同	98

四、无年号、日月同	100
五、采用对方年号、日月同	101
 第九章 从入元僧度牒的“涉外伪文书”看唐宋元时期东亚关系	103
一、入元僧度牒真伪	103
二、入唐僧“公检”	106
三、朝鲜国王的“伪国书”	111
四、赴日宋商“公凭”真伪	113
五、结语	117
 第十章 从“白村江之战”到“甲午海战”看中日两国在东亚地位之逆转	118
一、“白村江之战”前后日本构建律令制国家之路	119
二、“甲午海战”前后日本“脱亚入欧”之路	121
三、两次大海战所带来的反思	123
 第十一章 从大数据看“中日关系”	125
一、唐朝与日本交往的史料记载	125
二、宋朝与日本交往的史料记载	126
三、元朝与日本关系	127
四、明朝与日本关系	127
 参考文献	129
后记	133

第一章

从“旅馆贸易”到“唐房贸易” 看唐宋时期中日关系

在宁波博物馆里珍藏着三块石碑，上面记载了乾道三年（公元 1167 年），宁波（明州）在修某座寺庙的大道时，有三位居住在日本九州博多的宋朝商人分别捐了 10 贯钱。作为回报，寺庙在路边竖立三块石刻，石刻上面分别刻有“日本国大宰府^①博多津居住弟子丁渊捨”“日本国大宰府居住弟子张宁”和“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孝男张公意”等文字。其中前两块刻着“居住”的字样，而另一块碑刻上则使用了“寄”的表述方式，还特别注明捐献者张公意的籍贯“建州普城县”。这说明张公意只是一时“寄寓”住在日本。他们三人都是以博多为中心从事贸易的在日宋商，由此可见，在日宋商又分“寄寓”和“居住”两种贸易活动方式，或者说两个阶段更为恰当。而在“寄寓”的贸易形式中，宋商们究竟是临时“寄寓”日本政府所提供的指定宾馆还是普通宾馆？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唐代：“鸿胪馆”功能向兼商务性的转化

宋商到达日本，经过“存问”后，如果没什么问题，就会被安置在日本官方所指定的宾馆里，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开始交易，也称作“和市”。有日本学者认为：“宋朝以后海商被安置在大宰府所指定的“鸿胪馆”内居住，由政府支付滞留费。”^②那么宋商真的是在“鸿胪馆”内开展“和市”贸易吗？

^① 大宰府：是古代设在筑前国筑紫郡的政府机构，负责管辖九州以及壹岐、对马两岛兼防卫外敌入侵以及外交事务。

^② 大庭康時、佐伯弘治：中世都市博多を掘る[M]中榎本涉的“日宋、日元贸易”一节，海鸟社，2008 年，第 71 页。

日本“鸿胪馆”原本是模仿中国“鸿胪寺”而建，其功能也大体和唐代差不多。“鸿胪寺”是由北齐的“九寺”转化而来，唐代时期其称谓传入日本。其中“鸿”字由“大鸟”转化而来，表示“大”的意思，“胪”字有“腹”的意思转而表示传送之意。而“鸿胪”则表示报告有外交使节来访之意。

在唐朝，鸿胪寺是唐朝设置的管理蕃客的专门机构，是唐朝与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司农寺、太府寺齐名的九寺之一。鸿胪寺担负着接待周边诸蕃入朝使者的繁重任务。诸蕃派往唐朝的使者，主要有朝贡、和亲、告哀、求请、贸易、献捷等。这些使者到长安后，各类活动都由鸿胪寺负责安排^①。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至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二百余年间，日本派“遣唐使”来唐十三次，加上“迎入唐使”“送客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又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从武则长安安三年(公元703年)到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的一百九十五年间，新罗以“贺正”“朝贡”“谢恩”“入宿卫”等各种名义，向唐朝派遣使节团次数共八十九次，平均每两年就派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年就派二至三次。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日本在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期间，随十三次遣唐使入唐的留学僧和学问僧就有149人。

日本“鸿胪馆”建造于平安时期，是用于外交的迎宾馆，设置在平安京(京都)、难波(大阪)，以及筑紫(福岡)3个地方。文献上最早的记载是持统二年(公元688年)，以“筑紫馆”的名称出现，平安时期以后改名为具有中国韵味的“鸿胪馆”。从7世纪后期到11世纪的约400年期间，迎接遣唐使、新罗使节团等。

公元872年5月，渤海国使者杨成规出使日本，被安置在“鸿胪馆”并在那里接受日本大宰府牒和敕书。据日本史料《日本三代实录》记载：

贞观十四年五月廿五日甲午，勅遣参议右大辨从四位上兼行赞岐守藤原朝臣家宗于鸿胪馆，赐勅书，大使已下再拜舞踏，大使杨成规膝行而进，北向跪守，勅书太政官牒函、勅书曰：天皇敬问渤海国王。^②

公元883年，日本文章博士菅原道真在“鸿胪馆”设宴接待渤海国大使裴颢，并赋诗以文会友，“(元庆)同七年四月廿一日，缘饗渤海客，權行治部大辅事，是时道真與渤海大使裴颢文赋贈答詩數首，文章載紀，使稱曰：道真文筆似白樂天也”^③。公元895年，菅原道真奉旨在“鸿胪馆”设宴款待渤海大使裴颢，“宽平七年五月七日癸亥、渤海客來、著鴻胪館，十五日辛未，參議左大辨菅原(道真)朝臣向鴻胪館賜酒饌于客徒”^④。由此可知，“鸿胪馆”作为日本国宾馆承担着接受、递交国书以及

① 《唐会要》卷66，鸿胪寺。

②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二，《三代实录》卷二十一，大宰府天满宫，1964年，第236页。

③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二，《菅家御傳記》，第332页。

④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三，《日本紀略》，第89页。

接待外交使者的重任,代表着国家的尊严。

除此之外,“鸿胪馆”还是“遣唐使”以及“入唐僧”的出入之地。公元837年3月,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和遣唐副使小野篁在出发前就临时住在“鸿胪馆”里,“承和四年三月壬午、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出自鸿胪馆、发向大宰府”^①。公元858年,日本入唐僧圆珍回国,先被大宰府安排在“鸿胪馆”里,然后再返回京都,“十九日平明、傍山行至本国西界肥前郡松浦县管美旻乐琦、天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回至大宰府鸿胪馆,十二月二十七日、达帝都”^②。另外,公元862年10月,入唐僧高岳亲王、宗睿等乘坐唐朝翻译张友信的船也是从“鸿胪馆”出发起航抵达明州扬扇山的,其史料如下:

(贞观三年)十月七,仰唐通事张友信造船一只。四年五月,造船已了,时到鸿胪馆。七月中旬,率宗睿和尚并船头高岳真今(岑)等,僧俗合六十人,驾舶离鸿胪馆,赴速值嘉岛。八月十九日,著于远值嘉岛、九月三日,从东北风飞帆、其疾如矢。……七日,午尅遥见云山、未尅著大唐明州之扬扇山。^③

以上事例说明,“鸿胪馆”当时主要是以其国家的政治功能而存在,它具有接待安置外国使节,以及国家政要出访前后的下榻之地等功能,而且“鸿胪馆”作为国家的国宾馆是不允许外国客商居住的。

那么日本政府又是如何安置外国客商的呢?我们可从公元842年8月颁布的“太政官符”中略见一斑:

太政官符

应放还入境新罗人事

右、大宰大貳从四位上藤原朝臣卫奏状称,新罗朝贡其来尚矣,而起自圣武皇帝之代迄于圣朝,不用旧例,常怀奸心,苞茅不贡,寄事商贾,窃国消息,望请一切禁断,不入境内者,右大粮臣(源常)宜奉勅。夫德泽泊远,外蕃归化,专禁入境,事似不仁,宜比于流来,宛粮放还,商贾之辈飞帆来著,所带之物,任听民间令得回易,了即放却,俱不得安置鸿胪,以给食品。

承和九年八月十五日^④

①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一,《续日本后记》卷六,第37页。

②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二,《園城寺文書》第36页。

③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二,《入唐五家传》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第98页。

④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一,《類聚三代格》十八,第420页。

“商贾之辈飞帆来着，所带之物，任听民间令得回易，了即放却，俱不得安置鸿胪”，简言之，当时日本政府对外国客商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允许他们入国，原因是担心他们从事“窃国消息”搞间谍活动；另一种是可以在境内自由地和民间进行贸易，但不允许住在属于迎宾馆级别的“鸿胪馆”。

不过，到了公元865年，“鸿胪馆”的功能似乎开始逐渐兼有经济功能。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公元865年7月，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六十三人来到日本，大宰府奉朝廷之命把他们安置在“鸿胪馆”之内，“贞观七年二十七日丙午，先是大宰府言，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六十三人驾船一艘，来著海岸。是日，敕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①。《日本三代实录》还记载，大唐商人张吉等四十一人，于第二年9月乘船靠岸后，大宰府依旧奉旨，将其安排到鸿胪馆，“九月一日大唐商人张吉等卅一人驾船一艘来著大宰府。是日，敕大宰府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②。这表明“鸿胪馆”的功能其实在唐朝后期就开始转变，由政治功能蜕变为兼具商业功能。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政府转变态度，把来自海外的客商集中安排在一起居住，而不再“任听民间令得回易，了即放却”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1）便于对商人的统一管理。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日本贞观六年（公元864年），大宰府言，大唐通事张友信渡海之后，未知归程，唐人来往亦无定期，请友信来归之间，留唐僧法惠，令住观音寺，以备通吏、太政官处分、依请。”^③意为：唐朝翻译张友信回国，不知其回程，而他的行程也实无定期，于是就把唐朝僧人法惠安排在观音寺里居住，以等待翻译张友信再次来日。可见，政府统一安排驻地便于提高效率、掌握商人情况。

（2）维护国家安全。日本政府担心大量的外国商人不断往来日本会危及其国家安全，据资料《日本三代实录》卷十二记载：“关司出入，理用过所，而今唐人入京，任意经过，是国宰不慎督察，关司不责过所之所至也，自今以后若有惊忽，必处严科。”^④显然，担心国家的安全才是最主要原因。

但是，没过多久，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日本又取消了这种把外国商人安置在“鸿胪馆”的做法。公元868年，日朝廷接到大宰府报告，新罗海盗乘船袭击博多，掠夺了丰前国的年贡绢锦然后逃窜，“宰府言，去月廿二日夜，新罗海贼乘舰二艘来博多津，掠夺丰前国年贡绢绵，即时逃窜，发兵追之，遂不获贼。”^⑤日本清河天皇深感：博多是邻国入侵的跳板，军事要塞，而且距离“鸿胪馆”只有两站之遥，所以必须在“鸿胪馆”部署重兵，以防不测，“博多是邻国幅輳之津，警固武卫之要，而壤与鸿胪馆、相去二驿，若兵出不意，仓卒难备，请移置统领一人·选士卅人·甲冑

① [日]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日本三代实录》卷十三，第213页。

②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二，《日本三代实录》卷十三，第140页。

③ [日]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研究》，《日本三代实录》卷二六，第212页。

④ [日]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研究》，《日本三代实录》卷十三，第213页。

⑤ [日]竹内理三：《大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二，《日本三代实录》卷十三，第160页。